

比较政治学的危机与出路

——从理论、问题与方法互动的角度

欧阳景根

[摘要] 理论、问题与方法是一门成熟学科的核心要素。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现在遭遇到了空前的理论、问题与方法危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忽视或割裂了理论、问题与方法之间的关系,使得它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相互促进与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比较政治学的持久发展需要我们探索出一种理论、问题与方法的良性互动机制,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坚持理论、问题与方法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比较政治学;理论;问题;方法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9)04-0482-06

一、作为学科核心要素的理论、问题与方法

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其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问题(或自己独占的核心研究题域),运用自己的核心研究方法,发展出了为这一学科领域的学者所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的成熟的理论、独立的研究问题与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一门成熟学科的核心要素。

问题是指作为研究对象与内容的问题域,又被称为研究主题。根据不同的抽象层次,可以对问题进行不同的分类。比如在政治学研究中,从最高的抽象层次来看,研究的问题就包括政治秩序、政治体制、社会行动者、民主与国家机构、经济过程与超国家过程这五个主题。而从中间的研究层次来看,关于政治秩序的研究又可以分解为国家形成与国家崩溃、战争、革命、民族主义、内战与暴力、种族冲突这么几个主题;政治体制的研究又可以细分为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民主化与民主崩溃的研究;社会行动者的研究可分为社会运动与市民社会、利益集团、公民态度与政治文化、宗教、庇护主义的研究;民主与国家机构的研究包括政党、民主制度、司法制度、官僚制度、军队与警察、政策制定等的研究;经济与超国家过程的研究包括经济政策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全球化、超国家整合及其过程等的研究^[1](第9页)。

方法一般包括战略层次与技术层次两个层次的方法。战略层次的方法对应的英文词语是 approach,它的意思是指研究的视角或路径,又有学者把它理解为研究的取向或研究进路。它是指学者用以研究和分析具体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工具”,更具体地说,它是指学者从何角度去分析各种政治现象。在政治学中,这些研究的“理论工具”包括(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行为主义等。打个比方说,你要把一枚钉子钉入木板,你是选择用锤子把木板砸向钉子还是选择把钉子砸向木板。虽然两种途径都可以实现你把钉子钉入木板的目的,但总有一种“理论工具”或理论途径更加有效快捷和省力,事实证明选择把钉子砸向木板的理论工具要省力些。因此在研究时为了更能解释你的研究对象,实现你的研究目的,你会选择那些在你看来更有利于解释问题与现象的理论工具或理论路径。这样在对个体的政治行

为进行分析时,你可能选择的是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理论、问题与方法的界线。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战略层次的方法与本文标题中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们经常听到诸如“制度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说法,其实严格看来把它们称为理论至少是不准确的。在我看来,理论就是指某一学者提出的具体的学术观点或见解,或者更为明确地说,理论就是指诸如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序列观”那样的具体学术观点。无一例外的是,只要一提到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学者都知道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与具体所指。而我们常听到的诸如“制度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说法,更像是一个选择从哪个角度去分析你致力于研究的对象的问题。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阶级与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说法又表明了你的研究问题域所在。因此,政治发展、阶级与国家、政治文化等既可以是一种战略层次的研究理论工具或路径,又意指研究主题,即你研究的是政治文化还是政治发展,或研究其他别的主题。

策略与技术层次的方法对应的英语单词是 method,它是指你具体采用一种什么技术手段或“技术工具”去分析你的研究对象。再打一个同样的比方,你要把一枚钉子钉入木板,你是选择用锤子还是选择用石块。在此处,锤子与石块就是这样一种作为“技术工具”的方法。比较政治学的技术层次的研究方法总体上包括质的研究方法与量的研究方法^[2](第13页),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可以分为个案研究、集中比较与统计分析三种^[3](第113页)。而本文中要加以研究的研究方法指的是战略层次的研究方法。

总之,理论是指为学界基本接受的学术见解与观点,问题是指学科的研究主题与领域,方法是指学者进行研究时所选择的“理论工具”或路径,但三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同时,三者又是构成一门成熟学科的最为核心的要素。

二、比较政治学的现状与危机

作为政治(科)学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的比较政治学,其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与政治学同步进行的;换言之,自亚里士多德时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伊始,比较政治学也就同时产生了。因此,比较政治学是一门历经数千年发展的学科,然而像政治学一样,比较政治学又是一门不够成熟的学科。既然衡量一门学科成熟与否可以从它的三个核心要素即理论、问题与方法来衡量,那么我们要了解比较政治学的现状、危机及其成因,也可以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问题与方法及其关系来进行。

首先,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群来看,正如奇尔科特所看到的,比较政治学历经数千年尤其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主要形成了以下理论群:系统理论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理论与不发达理论、阶级理论。然而,除了在政治文化理论与发展理论与不发达理论这两大理论群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理论本身与理论界的学术联系之外^[4](第3-26页),正如阿尔蒙德所观察到的,在它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学术联系,而是出现一种派系林立、理论孤岛林立的现象,各理论派系与理论孤岛之间缺乏彼此沟通的桥梁,缺乏一般的共识性的理论和理论共识,缺乏在各理论孤岛之间相互推动、彼此吸取营养的渠道^[5](第13-31页),虽然也有学者把这种理论派系林立当成一种多元性而加以追捧^[6](第242-246页)。另一方面,正如胡安·林茨所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理论框架下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而这又影响到了既有理论的解释力。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需要经受住时间的检验^[7](第26-31页)。而为了使理论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就需要学者们不断关注研究背景的变化。

其次,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问(主)题来看,第一,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的出现过于受现实需要的影响,而没有受学科发展需要的积极驱动。比如对于政治发展的研究,就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兴独立国家现实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需要的影响;又比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研究,也是受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后前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拉美等威权国家面临新的政治道路选择的影响。换言之,学科研究主题的形成与发展,基本上受现实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需要的被动驱使,在新的研究主题出现的过程中,我们很少能发现学科动力因素促使的研究主题的出现。第二,在比较政治学

的研究问题域中,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这就正如林茨注意到的,比较政治学学者对政治领导人与政治精英品格的研究有所忽视。而在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看来,对全球化的研究也不充分。第三,有些问题虽然一直得到研究,但是研究的成果并不健全,对一些问题我们仍然找不到有充分说服力的答案。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权威的产生、维系与运行的问题。比如在亚当·普热沃斯基看来,为什么文官能控制军队?是什么机制使得政党成员凝聚在一起?在这些研究主题上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指作为理论工具的研究方法,而非具体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看,与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不同的是,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也没有发展出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研究方法。正如亨廷顿以及其他许多政治学家注意到的,比较政治学过于受其他学科的影响。比如伊斯顿的系统理论(指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主要受社会学家帕森斯理论的影响;而在近 30 年中,比较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几乎受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统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政治学的这种统治的表现形式就是,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泛滥使用和数学模型的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学者主张用政治的理性选择理论来综合科学模式与释义模式两种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模式,而这种做法事实上等于是把政治学包括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命运系于其他学科尤其是系于经济学身上^[8](第 261-264 页)。

总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问题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比较政治学都危机四伏,问题重重。那么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何在呢?

三、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问题与方法的关系

纵观比较政治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国家研究阶段、20 世纪初至二战前的传统研究阶段或多元主义阶段、战后初期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行为主义阶段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后行为主义阶段。把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划分为上述四个过程,其标准与依据是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其关注的主流问题、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与产生的主流理论,都各不相同。

在现代比较政治学形成时期的第一阶段即国家研究阶段,正如伊斯顿所指出的,“一旦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规制权力分配的法律得以制定,我们就可以获得政治制度如何运行的准确认识”^[9](第 134 页)。因此,这一阶段主要运用正式的法律/制度研究方法,对发达国家的正式制度进行研究。这一阶段政治科学的主要实际任务就是帮助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10](第 487 页)。因此,在这一阶段,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问题与方法之间,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比较和谐与一致的关系。

在传统研究阶段,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源于威尔逊等人。他们在对正式制度的研究中发现,在正式制度的周围,还存在着大量影响决策的非正式的行为与组织。这种发现使得政治学研究的注意力由正式的法律结构向围绕着它们的非正式的行为转移。因此这一时期政治学的主要学术任务或议题就是描述在政治生活中制度如何运行以及人们如何行为的。然而,如伊斯顿所指的,在这一阶段,“方法在他们看来并不会成为问题,就像这些要求予以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一样”。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具有本阶段鲜明特色的研究方法。因此,总体上看,在这一阶段,在理论与问题的关系方面是比较一致的,然而在方法上缺乏与前二者的相互有机联系。

行为主义阶段是一个根本不同于前面两个阶段的学术发展阶段。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关注的是制度(不管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那么这一阶段主要关注的是个人以及他们的行为,并把政治行为视为政治科学的基石。与此前政治学研究结构、权力与职责不同,行为主义者研究态度、个性和有形的具体活动(如选举和游说)。为了更好地研究态度和行为,伊斯顿提出了他的系统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他把整个政治过程分解为输入(行动者的要求、支持)和输出(体系层次的政策输出)与反馈,以寻求对他们追问的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即,“为什么个体行为者、组织性的行为者以及民族国家会以他们行事的方式行事?”^[12](第 59 页)它的有别于前面两个阶段的主要特色在于: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被发现的一致

性;这些一致性又可以通过经验检测来加以确认;关键是看运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在这一阶段,方法本身也是可以受到质疑的,对方法的要求更高了。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在理论、问题与方法三者之间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与和谐。但是这一阶段的缺点也异常显著,那就是它过于关注对现状的描述而非关注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用艾萨克的话说就是,它“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细小琐屑的问题上,对真正重要的问题很少注意”^[11](第52页)。

然而,对行为主义的批评随着美国民权运动与越南战争的相继发生而达到顶峰,对这些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与重大社会问题缺乏远见,导致行为主义走向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是后行为主义。这是一个真正多元化的时代。从此,学者们一方面对传统的研究主题继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对环境污染、种族、性别与社会平等、核战争等新问题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的直接结果就是公共政策的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又促成了理性选择等研究方法的大量运用。因此,就这一阶段来看,在理论、问题与方法三者的关系上,其发展是比较和谐一致的。

尽管从比较政治学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阶段来看,除了传统阶段外,在其他每一个阶段内部,在理论、问题与方法三者关系上总体上达成了一致关系,但在每一阶段内部还是在三者之间有所侧重。在第一阶段,比较政治学主要关注的是理论,即如何建立一个国家的健全的制度;在第二阶段,主要关注的是研究的主题,即非正式的制度与行为;在第三和第四阶段,主要侧重的都是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另外,如果把整个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根前后相关的逻辑主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理论主线—问题主线—方法主线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逻辑断裂,并没有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和谐的相互推动与促进的关系状态。从理论主线来看,由第一阶段的国家理论、第二阶段的集团理论到第三阶段的行为理论以及第四阶段的公共政策理论,这四者之间找不到一种逻辑上的前后相承的发展脉络,几种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割裂的;从问题主线来看,由第一阶段的如何建设民族国家、第二阶段的关注非正式组织与行为、再到第三阶段的对个体行为与个体态度的关注、第四阶段对现实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关注,其间的前后取代、递进与发展也缺乏一种一脉相承的逻辑传承关系;从方法主线来看,第一阶段的制度研究方法(又称制度主义)、第二阶段没有明确的方法、第三阶段的系统分析方法与第四阶段的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等研究方法,同样没有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一旦某一研究方法占据主流地位,便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如果你拥有的唯一工具是锤子的话,那么你周围的一切事物看起来都像是钉子”^[12](第19页)。如果从这三条主线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也看不到在它们之间有什么密切关系,而事实上它们之间并无任何相互关系,它们之间就像是三条平行线,始终没有出现交叉与重叠的地方。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正如在前面的第二部分已经论述到的,理论与问题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学科动力方式,即学科缺陷的存在与学科发展动力因素,促使我们必须对新的研究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另一种方式是,现实动力因素,即现实问题的出现需要我们对新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问题的双边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问题主要是第二种方式。现实关怀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味地关注于现实问题,而不注重学科本身的需要,势必会随着新的现实问题的不断出现而产生一些彼此并不相关的理论孤岛。尽管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因为认识到学科研究领域的缺陷并受到学科发展动力(此处动力特指致力于研究领域的完善)的推动来研究非正式的组织与行为,但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正是这一阶段,成了两次学科转变的过渡阶段,也正由于在这一阶段对学科问题的研究力度不足,才导致这一阶段研究成果较少,并成为比较政治学四个发展过程中一个略显次要的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比较政治学的问题与理论的发展,既需要现实动因,更需要学科动因。从问题与方法的关系看,在问题与方法之间既要形成一致关系,但又不能把这种关系绝对化。同时,在理论与方法之间,方法固然是产生理论的好的必要前提,但并非是产生理论的充分条件。这里有一个对结构功能主义者误解理论与方法关系的绝妙讽刺:即,一个持结构功能主义倾向的行为主义者看见一只狗在树边撒尿,于是得出结论认为,“树的存在,就是为了让狗在上面撒尿”^[12](第24页)。当然,割裂理论与方法、问题与方法之间关系的做法也是不合适的。认为任何问题可以用任何方法进行研究的

看法,与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需要合适的方法的看法,同样的愚蠢。

最后,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了新的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新的理论的需要,政治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们总是试图从其他学科中寻找可用的方法,而没有注意在政治学内部挖掘和发展新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学科间的借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伊斯顿的系统论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主要借自社会学)及其滥觞,以及在第四阶段对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性选择路径的使用。这种“懒汉”式的方法借用捷径,造成了比较政治学直至今日尚没能形成作为一门成熟学科标志与核心要素的系统成熟的独立研究方法。

总之,正是由于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问题与方法之间缺乏一种和谐一致的关系,才使得比较政治学遭遇到了现在面临的种种困境。

四、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方向:理论、问题与方法发展的互动机制

摆脱比较政治学中理论、问题与方法关系困境的出路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问题与方法三位一体。对于包括比较政治学学科在内的任何社会学科而言,理论、问题与方法都是学科的核心构成要素。仅有某一方面的发展而缺乏其他两方面的同步发展和推动对于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缺乏问题驱动的理论(为理论而理论),只是不能解决实际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形而上的抽象理论,缺乏理论指导的问题研究只能被归结为对策研究,而缺乏适当的科学方法指引的理论研究与问题研究往往只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无法发现客观事实与真理。

第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及比较政治学的持久生命力,依赖于我们在研究中能否始终坚持理论、问题与方法的有机统一。例如,在传统的制度主义来看,制度决定一切,并把国家看成是一个解决争端的独立的裁判者,但有很多理论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国家也是众多社会行动者中的一员,因而有其特殊的利益要求。这样看来,传统制度主义框架下理论的说服力的不足,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学科地位。因此学者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去发现、探索与解释新的政治现象,给传统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做到理论、问题与方法的统一,进一步完善与丰富过去的主要理论体系。

第三,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是寻找理论、问题与方法的互动机制,并利用这一机制,针对合适的问题、运用合适的方法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要发现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首先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现有的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与方法分别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从历史的角度,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始终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使命。重大现实问题的出现以及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为新的理论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与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时可能会有适用于它的不同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研究背景的变化,比如当代政治性质的变化,新的政治现象、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今世界的政治主题已经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发生转变,而这种主题的转变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与思路。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学科发展本身的角度,借助学科发展的内部动力,从学科内部寻找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可供研究的问题,而不能把目光仅局限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上。

第五,萨托利所指的在比较政治学中存在的两种倾向:即方法过度自觉的倾向——要把比较政治学研究完全变成一种科学诉求的努力(比如数学分析模型的建立)以及把比较政治学寄托于从其他学科引入其研究方法的想法与做法,以及方法无意识的倾向^[13](第 1033 页)——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进行比较、并认为方法对于研究而言无关紧要并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忽视方法的想法与做法,实际上阻碍了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核心研究方法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的建立与长远发展。我们要在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化与非科学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第六,政治权力的架构与运行始终是政治学的永恒主题。因此,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制度研究始终是比较政治学的重大理论课题,制度主义始终是它的主流研究方法,摆在比较政治学家面前的

任务是如何去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制度主义,使它更适合于解释新条件与新环境下(即制度的外生环境发生变化)的制度架构与变迁及相应的政治现象,而不是消极地抛弃制度主义。

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问题与方法的有机统一,才能在理论、问题与方法之间达成一致与和谐关系,并相互吸取营养与动力,比较政治学也才有可能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Munck, Gerardo & Richard Snyder. 2007.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1).
- [2] [美] 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景跃进、张小劲、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3] [英] 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比较政府与政府导论》,张小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4] Pye, Lucian & Sidney Verba. 1965.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5] Almond, Gabriel. 1990.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6] Wiarda, Howard J. 1991.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Westview Press.
- [7] Munck, Gerardo & Richard Snyder. 2004. "What Has Comparative Politics Accomplished?" *Newsletter* 15(2).
- [8] [美] 唐纳德·穆恩:《政治研究的逻辑:对立观点的综合观》,载[美] 格尔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9] Easton, David. 1985.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ast and Pres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
- [10] Dryzek, John S. 2006. "Revolutions without Enemies: Key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4).
- [11] [美] 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郑永年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12] Shapiro, Ian. 2004.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3] Sartori, Giovanni.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4).

(责任编辑 叶娟丽)

The Crises and Futur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uyang Jinggen

(Party School of He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Shijiazhuang 050061, Hebei, China)

Abstract: Theories, problems and methods are three core elements of a mature discipline. Comparative politics is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theoretical, problematic and methodological crises which are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during its developing process,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were so ignorant to, or divid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ory, problem and method that there exist no mutually supporting and improving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needs us to build a well operated interactive system of theory, problem and method, and uphold the unification of them in our studies.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y; problem; method